

# 美苏田径对抗赛形成的国际政治信号分析及其意义阐释

顾帅<sup>1</sup>, 于思远<sup>2</sup>, 朱娜<sup>1</sup>, 刘桂海<sup>1</sup>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2.清华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084)

**摘要:** 体育外交研究的纵深化趋势呼唤跨学科研究方法以推动理论的破壁。运用国际政治信号理论对冷战时期美苏围绕田径对抗赛的外交互动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美苏田径对抗赛是冷战时期两国关键的政治协商渠道, 通过多轮次体育外交信号的编码、传递、解码与反馈, 促成了美苏首份文化交流协定并推动两国全面合作, 构建冷战中难能可贵的良性竞合关系。基于国际政治信号理论提出: 体育外交促进国家间关系呈现特定效果范围, 具体指向外交信息的传递、战略诚意的表达和安全困境的化解。体育外交作用机理能够提供意义共有的外交信号编码方式、构建安全可靠的外交信号交换空间和赋予生动有效外交信号转换能力。

**关键词:** 体育外交; 国际政治信号理论; 美苏田径对抗赛; 国家间关系

中图分类号: G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4)03-0014-07

##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gnal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USA-USSR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GU Shuai<sup>1</sup>, YU Siyuan<sup>2</sup>, ZHU Na<sup>1</sup>, LIU Guihai<sup>1</sup>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trend of in-depth research on sports diplomacy call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o promot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Usin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gnaling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SA-USSR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USA-USSR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is a key political negotiation channe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rough multiple rounds of encoding, transmission, decoding and feedback of sports diplomatic signaling, led to the first cultural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also promot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which establishes a benign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hat's rare in the Cold Wa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gnaling, it is proposed that sports diplomacy promotes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nd exhibits specific effect areas, specifically pointing to the transmission of diplomatic information, the expression of strategic sincerity, and the resolution of security dilemmas. The realizable mechanism of sports diplomacy is to provide a diplomatic signal encoding method with shared meaning, to build a safe and reliable diplomatic signaling exchange space, and also to endow vivid and effective diplomatic signaling conversion capability.

**Keywords:** sports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gnaling theory; USA - USSR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inter-state relations

收稿日期: 2023-11-18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2BTY001);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课题(2022-11-23-LXHT010); 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专项项目(2023ECNU-WHCCYJ-04)。

作者简介: 顾帅(1995-),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外交、体育史。E-mail: guaiwojia@163.com 通信作者: 刘桂海

体育具有外交功效,这既是实践经验,也是理论共识。进一步追问体育外交的作用,简单且模糊的“体育外交可以促进国家间关系”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学术回答。与此同时,用盛大赛事彰显国家实力、以代表团互访证明关系友好,以及通过体育抵制表达不同政见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只是体育外交的现象归纳而非学理探讨。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兴起“呼唤中层理论”的思潮,体育外交研究也应当努力推动从范式理论到中层理论、微观理论的转向,要超越简单的历史叙事与现象归纳,运用科学规范的理论阐释体育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的本质与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问题,实证考察20世纪50年代的美苏田径对抗赛的形成过程,借助国际政治信号理论对两国体育外交现象进行深入学理剖析,尤其注重体育外交信号的作用与互动过程。研究设计的核心出发点,一是我国学界对国际体育外交史关注较少,尚未有美苏田径对抗赛的系统研究,且美国国家解密档案为探索体育与政治的互动机理提供权威史料支撑;二是引入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体育外交现象进行规范和严谨的分析,以“他山之石”阐释体育外交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更新与方法创新价值;三是美苏田径对抗赛是经典的体育外交案例,证明两个大国可以在极为严峻的冷战安全困境下通过体育实现有效沟通与友好合作,在当前国际局势愈发动荡、大国博弈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梳理美苏体育外交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国际政治信号理论及其对体育外交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 1.1 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源起与核心内容

国际政治信号是一种显示不可观察意图的可观察媒介,主要指传达信息的声明或行为,旨在影响接收者对发送者形象的认知<sup>[1]</sup>。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行为意图具有私密性,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对称难题,导致国家间信任困境。因此,如何评估国际政治信号的真实性是困扰每个国家的难题。信息弱势方为防止被欺骗,往往会生成一套信号识别与筛选机制,形成了“发信号”与“甄别信号”的对应活动。国际政治信号的战略价值在于它能帮助推断内隐的意图,缓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信任困境,只有展示更多私有信息才能缓解信息劣势方的意图猜疑,避免不信任螺旋的产生<sup>[2]</sup>。由此,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传递过程至少包括信号发送者和信号接收者两方,首先是发送者主动展示信号,然后接收者努力捕获和甄别真实信息,通过判断与理解,最后呈现为外交行为的变化。

具体而言,外交信号的博弈过程主要包括试探和确认两大阶段。在试探阶段,信息不对称的信号传递者和接收者进行一轮或数轮外交信号的编码、传递、解码和反馈过程,最终双方实现对外交信号所包含的战略意图的确认,并通过实际行动呈现。

其一,“理性主义信号理论分析”延续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认为可以通过主动提供“昂贵信号”增加自身的可信度。昂贵成本信号传递的核心在于:高成本的信号只有真正有实力或有诚意的行动者才能发出,能够区分诚实者与欺骗者。昂贵成本信号有两种:一是“沉没成本”信号,二是“捆绑双手”信号,这两种机制有可能同时发挥作用。前者指的是事前增加做某件事的成本以表达决心和对目标的渴求,通过提前支付这些成本向观众表明其意图的真实性;后者指的是主动增加不做某些事的成本,以表明事后一旦违背承诺,自身将负担高昂的成本。

其二,“认知主义信号理论分析”遵循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更加关注信号传递,认为信号甄别与认知才是信号发挥作用的核心环节。杰维斯<sup>[3]</sup>指出廉价信号同样具有可信度,大多数廉价话语的产生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源,只是成本难以为外界观察而已。并提出了在知觉层面影响信号判断的4种机制:第一,统一性知觉。第二,过高估计自己作为影响者和影响对象的重要性。第三,愿望与恐惧的影响。第四,认知失调<sup>[4]</sup>。

综上所述,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间面对信息不对称困境如何展开外交活动,进而消除主体间性并化解信任困境。研究路径是理性主义信号理论分析与认知主义信号理论分析。研究主要结论是通过增加信号的成本与对知觉困境进行审思与化解是解决国家间信任危机的主要通路。

### 1.2 国际政治信号理论对体育外交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入场,为体育外交打通微观维度研究路径。信任困境作为无政府秩序下国家外交互动的客观条件,导致了彼此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的信任阻断,进而造成大量时间、制度成本的流失。在正式渠道外交互动无法有效克服信任困境的情况下,非正式渠道便成为了重要路径。正如国际政治信号理论指出,在有效意图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可以汇总多种不同渠道的信号信息,以形成对他国意图的基本信念,体育外交由此成为多外交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从理性主义信号理论思考体育外交。体育外交能够塑造“昂贵信号”是因为体育的受众具有普世性,进而形成庞大的外交观众群体。经过大众媒

体与体育的耦合,体育场上的每个细节都会得到充分放大并投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经过这样系统加持的国际政治信号形成了难以颠覆的信号成本。体育外交信号具有广泛的民众舆论基础,任何一方采取背弃行为都将承受道义指责。

另一方面,从认知主义信号理论思考体育外交。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人类世界充斥着主体间性,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认知屏障造成了信任困境。因此,只有在长时间线上保持交往对话,通过不断增进理解以降低主体间性,形成自我与他者的和解。体育作为全球化的社会活动,通过赛事及其延伸的种种方式为各类共同体提供了常态化的交流互动平台,提供覆盖全人类的共享文化背景,外交信号在这个场域中的交换能够最大化地消除因不同共同体身份所造成的主体间性差异。最终,外交通过体育之共有规则的环境功效化解“知觉困境”,并推动外交信号的有效传递。

## 2 美苏田径对抗赛中的国际政治信号互动

美苏田径对抗赛是1958—1985年间举办的双边体育赛事,被誉为“最伟大的赛事”<sup>[5]</sup>,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抗背景下有着“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对抗”<sup>[6]</sup>的政治隐喻。为组织该赛事,美苏于1953—1958年间展开长达6年的外交谈判,甚至赫鲁晓夫亲自向美国发出体育邀请函。通过美苏田径对抗赛的谈判,突破性推动了美国废除《移民与国籍法》(又称《麦卡伦·沃尔特法案》),还促成美苏历史首次签订《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协定》(又称《莱西·扎鲁宾协定》),构建了冷战时期美苏罕见的竞合关系,对冷战走势与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两国的赛事谈判进程完整反映了体育进入并促进国家间关系的过程,彰显了体育独特的外交信号价值。

### 2.1 美苏体育外交信号的战略基础:文化冷战的兴起与受阻

1949年后美苏构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平衡格局,推动冷战向包含军备竞赛、经济封锁、文化抵制等全面对抗转型,心理、宣传与文化等“软”因素愈发受到重视。解密档案显示,1950年3月苏联《关于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措施》批评“美国文化的腐朽性”<sup>[7]</sup>,打造国家、协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反美文化宣传体系,成为苏联文化冷战的纲领性文件;同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被誉为“美国冷战总蓝图”的NSC68号文件,强调苏联共产主义文化的威胁,将冷战界定为“意识形态的冲突”<sup>[8]</sup>。美苏几乎同时提升了文化的冷战战略地位,以此彰显制度优势并争夺意识形态胜利。苏联成立中央宣传鼓动部,推广以政治正能量为特征的苏维埃文化<sup>[9]</sup>,并专列财政拨款项目供给《美国

外交官的真实故事》等反美文学作品出版发行;杜鲁门政府所设立的国际信息与文化事务办公室则几乎是专门处理对苏文化交流的机构,计划并实施著名的“真理运动”。1948年《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明确提出“通过交流活动增加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间的互相了解”。然而,无论是对苏联红军合唱团的赴美邀请、美苏艺术品联合展览的举办意向,还是两国学生的联谊活动,都被苏联以“有损民族安全”<sup>[10]</sup>而拒绝。美国新闻署官员Yale Richmond长期负责对苏文化外交工作,指出“苏联的不回应与不明确答复使美国无法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抬起铁幕’,也无法瓦解苏联意识形态”<sup>[11]</sup>。随着1952年苏联禁止刊行《美国画报》,“美国之音”电台也在苏联境内遭到屏蔽,文化冷战陷入僵局。美国必须寻找有效且更加容易被苏联接受的文化对抗形式,从而为美苏体育外交信号的交互提供了关键战略基础。

### 2.2 美苏体育外交信号的试探阶段:多轮次“编码—传递—解码—反馈”

#### 1) 美国借助民间体育组织编码与传递体育外交信号。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为美苏冷战对抗提供新的契机。《真理报》以“世界优越性”<sup>[12]</sup>称赞苏联奥运成绩,彰显政治制度优越性,并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后出台“新战斗”体育战略,首要目标是赶超美国保持的田径世界纪录。美国政府敏锐发现了冷战向体育场域的延伸,意识到与苏联文化冷战新的可能渠道。然而,美国政府无法有力控制国际奥委会,必须重新搭建一个针对苏联的更具对抗性的体育竞技平台。在高度敏感的冷战政治背景下,此前数次对苏文化交流请求的失败引起了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议,杜鲁门政府招致许多批评声音,甚至提议要撤销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机构<sup>[13]</sup>。因此,确保苏联应邀不仅是冷战战略的需要,更有着稳定国内政局的作用。赫尔辛基奥运会后,美国政府开始计划邀请苏联组织双边体育赛事。出于“保全面子”的考虑,美国谨慎选择了由民间体育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向苏联发出邀请函。最终,1953年底美国业余体育联盟在政府部门的授意下向苏联发出了组织美苏田径对抗赛的试探性邀请<sup>[14]</sup>,实现了两国首次体育外交信号的编码与传递。

#### 2) 苏联解码美国体育外交信号并反馈拒绝原因。

苏联解码了美国体育外交信号背后的冷战对抗意图,并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拒绝了美苏田径对抗赛的邀请。苏联中央体育委员会主席Dmitry Posnikov反馈是因为美国的“旅行限制”<sup>[15]</sup>。“旅行限制”指美国1952年7月颁布的《麦卡伦·沃尔特法案》,以录入指纹等方式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入境,打造“亚洲禁区”。

美国国务院认为:“不应该冒着挑战法律的风险而解除对某些游客的入境规定,推动与苏联的文化交流是不可取的。”<sup>[16]</sup>尽管美苏田径对抗赛的首次协商因《麦卡伦·沃尔特法案》宣告失败,但双方通过低敏感性的体育外交信号通道构建了两国最初的信息互通机制,交换彼此的谈判意愿,苏联更是直接通过体育外交信号向美国表达自身的政治顾虑。

### 3)苏联传递体育外交信号与美国国务院的解码。

体育能够强化国族认同和表达外交“身份”<sup>[17]</sup>,是苏联树立国家形象、寻求国际承认的重要渠道。因此,组织美苏田径对抗赛高度契合苏联的冷战战略。1954年1月俄罗斯驻华使馆主动与美国业余体育联盟秘书长 Dan Ferris 重启了双边田径赛事的谈判。面对苏联官方传递的体育外交信号,美国业余体育联盟将其转交给美国国务院处理,并且,由后者出面应允此次邀请<sup>[18]</sup>。这是极为重要的外交反馈信号,由美国政府官方回应不仅表明对美苏田径对抗赛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信号互动主体具有了政治对等性。美苏之间的赛事组织进程逐步从体育信号交换转置为政治对话,本质上是两国的冷战权力博弈。

### 4)美国迟缓反馈体育外交信号引致苏联战略误判。

由于美苏不同的政治制度,两国对体育外交信号的解码与反馈存在决策差异。依据公开的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搁置了苏联的邀请函长达两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可能在田径运动会的相关细节进行预案与论证,同时对双方的田径竞技水平进行评估,进而在有把握战胜对手的前提下回复苏联的邀请。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决策缓慢,苏联判断这是一种“态度怠慢”并反过来拒绝美国。

### 5)美苏体育外交信号的中介效益与“噪音”干扰。

面对苏联体育外交信号的战略误判, Dan Ferris 多次出面为美国政府解释是因为赛程冲突并需要为墨尔本奥运会留足经费<sup>[19]</sup>。根据国际政治信号理论, Dan Ferris 的行动起到了重要的信号中介作用,为陷入信任困境的美苏继续保持外交互动提供了可能性。1956年8月苏联再次向美国发出1957年举办赛事的邀请,并表示承担赛事费用<sup>[20]</sup>。苏联在经济方面主动做出的利益让渡是一次成本高昂的体育外交信号,从而成为 Dan Ferris 与美国政府协商废除《麦卡伦·沃尔特法案》的重要筹码。同年11月业余体育联盟代表政府接受美苏田径对抗赛的邀请,并转达政府承诺:录入外国人指纹的规定将被废除<sup>[21]</sup>。然而,突发的国际政治事件再一次阻滞美苏田径对抗赛。匈牙利十月事件引致美苏关系高度紧张,冷战格局下的体育关系是国家关系的“缩影”,美国抵制并缺席1957年2月在莫斯科举

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事实上,美国的体育抵制也是一种“负面”外交信号,对美苏田径对抗赛组织谈判造成严重的“噪音”干扰。

### 6)苏联传递昂贵体育外交信号与美国非正式积极反馈。

作为“崛起国”的苏联,体育赛事带来的国际声望和阵营影响力增长是其在冷战中的核心利益。因此,1957年4月赫鲁晓夫亲自为苏联体育外交信号提供政治背书,他在美国媒体上公开向美国发出田径对抗赛邀请:“假如你们赢了,我们会为你们欢呼。”<sup>[22]</sup>从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看,苏联借助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出的体育邀请是一种昂贵外交信号,是通过体育方式向美国展示亲善友好的苏联形象,并充分表明组织美苏田径对抗赛的战略诚意。然而,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以及美国国内不同党派的政治内耗,尽管美国政府口头允诺了放弃采集苏联运动员指纹,但始终没有在实质上启动《麦卡伦·沃尔特法案》废除程序。

## 2.3 美苏体育外交信号的确认阶段:确认外交诚意并调整冷战战略

美苏通过多轮次体育外交信号的互动,充分识别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并确认了外交诚意,特别是苏联连续向美国传递承担赛事费用、赫鲁晓夫亲自邀请等特殊体育外交信号发出,在解围冷战信任困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自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麦卡伦·沃尔特法案》的废除。美国确认了苏联的体育外交信号,予以积极反馈并调整外交策略,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式微,白宫转变了过去隔绝苏联的外交信念。1957年10月《麦卡伦·沃尔特法案》退出历史舞台,次年1月官方联合公报宣布1958年在苏联举办首届美苏田径对抗赛、1959年在美国举办第2届赛事。以美苏田径对抗赛的举行为标志,两国历史性、突破性地调整了冷战战略,开启了全面合作进程,并以《莱西·扎鲁宾协定》的形式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图1完整呈现了美苏田径对抗赛谈判过程中国际政治信号的互动与博弈。美苏多轮次体育外交信号互动是废除《麦卡伦·沃尔特法案》的关键动因,从而在冷战全面对抗格局之下构建起难能可贵的文化交流机制,深刻地影响了美苏关系、冷战形势乃至世界格局。正如苏联学者 Алексей Попов<sup>[23]</sup>所说:“苏联和美国什么都在竞争,但只有在运动场上,两个大国的代表才面对面走到了一起。”美苏田径对抗赛构建了冷战时期珍贵的双边非政治交流平台,正是通过体育外交信号,两国能够有效对话、良好协商,从而坦诚地表明意图与诚意,避免了凭空无据的错误认知并对外交信任基线产生积极影响,最终实现体育独特的外交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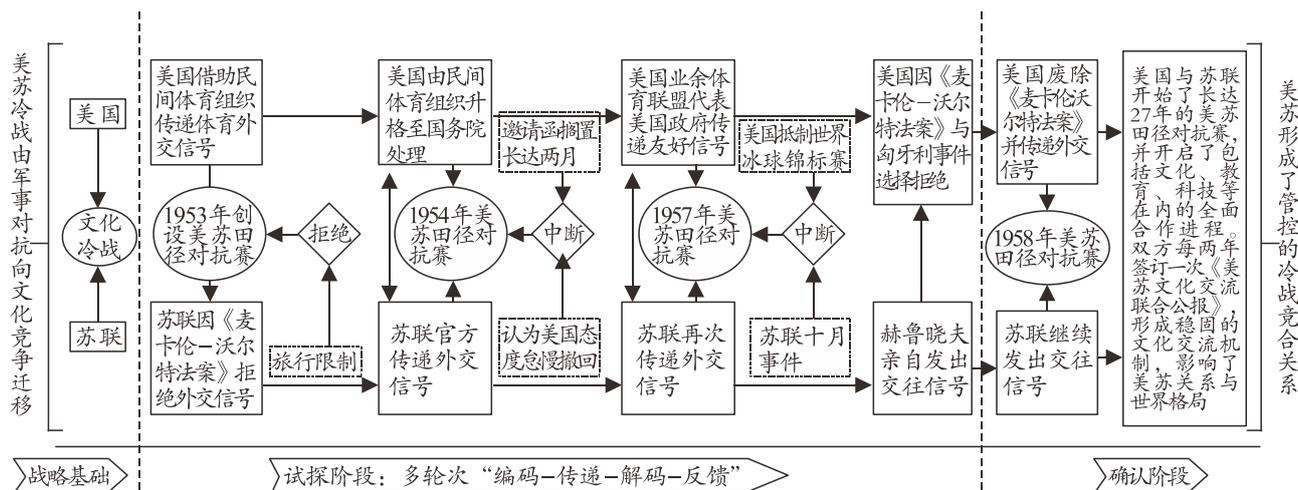


图1 美苏田径对抗赛国际政治信号的互动与博弈

### 3 基于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体育外交价值

#### 3.1 体育外交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实践效果范围

美苏田径对抗赛的谈判进程与《麦卡伦·沃尔特法案》废除进程高度同步，是苏美交换政治信息的关键渠道，特别是赛事促成《莱西·扎鲁宾协定》，证明体育外交作为国际政治信号的有效性与重要性。然而，整个过程中体育外交信号也存在失灵、遭到忽视，甚至美国对邀请函的迟缓反馈引起苏联战略误判，并且哪怕是苏联发出以赫鲁晓夫为政治背书的体育外交昂贵信号也未能直接促成赛事合约。放眼历史，不乏体育外交未能有效实现国家间信号交换甚至造成负面作用的案例。如阿根廷政府在1978年主办世界杯时捆绑民族主义情绪，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本国外交战略，通过体育谋得国内对外军事行动的支持，进而引发伤亡惨重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Stuart Murray<sup>[24]</sup>归纳为体育“反外交”作用，“滥用体育获取政治利益会造成人民和国家的分裂。”

基于美苏田径对抗赛中的多轮体育外交信号传递效果，以及历史上体育传递国际政治信号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可以发现，体育的外交信号价值有着明显效果范围。研究将之总结为“体育外交无法独立形成扭转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推动力，即对外部环境产生结构性的根本影响”。以美苏田径对抗赛为例，赛事谈判是启动与推动《麦卡伦·沃尔特法案》废除程序的关键因素，但当美国本土反苏情绪高涨并明确要求禁止与苏交流时，体育外交信号便几乎失效。此外，美苏田径对抗赛的外交信号也极易受到匈牙利军事冲突、更重要的奥运赛事等“噪音”干扰。但当美国转变文化交流想法与苏联达成交往共识时，体育外交信号便立即得到确认与积极回应，连带赛事合约在内的双边合

作协定迅速出台。因此，体育外交实现国家间政治信号有效互动的前置条件是：交往双方在本国内部已经初步形成接触的战略意图。不仅是美苏田径对抗赛，上述结论在中国与美国乒乓外交、朝鲜与韩国奥运外交、美国与古巴足球外交、印度与巴基斯坦板球外交案例中同样能够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析，体育外交区别于其他外交手段而对国际政治信号具有独特效果是因为“体育外交在国家间已形成合作意图但存在‘信任困境’时实现入场”，进而超越传统外交手段的价值。尤其是在高度紧张与敏感的大国博弈语境下，体育非政治性带来的“安全感”是体育外交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至关重要的价值。正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体育外交作用的评价：“由于运动员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就可以在不刺激美国舆论的情况下表明真意。”<sup>[25]</sup>必须说明的是，体育外交效果范围概念的提出并非是其限定或矮化为一种“辅助”作用，而是一种关乎外交信息精心编码以降低对方错误知觉、巧妙传递以确保对方正确接收和理解的艺术。在对体育外交的效果范围进行确证后，基于国际政治信号理论视域下的案例分析对体育外交信号价值进行系统阐释。

#### 3.2 体育外交的国际政治信号价值

##### 1) 提供意义共有的外交信号编码方式。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指出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主体间性，主体间性亦是国家间交往必须克服的障碍。因此，外交信息有效交换的前提是在一定范围内消除国家主体间性，一套标准化、被双方接受、具有共同意义的外交信号编码方式至关重要。相较于传统冰冷的外交谈判桌与针锋相对的声明书，现代体育是世界共通语言，全球共享的体育文化构建“共有意义

世界”,具有重要的跨文化交际功能<sup>[26]</sup>。体育中的友好、恶意、守约、犯规等行为可以得到清晰明确的界定与区分,体育的规则、制度等也会同等约束双方,这些价值特征同样会被带入体育外交信号的编码过程,确保体育外交信号的意涵能够被正确建构与解构。以美苏田径对抗赛的组织邀请函为例,与其说是一封同台竞技的“挑战书”,不如说是双方试图寻求合作的“橄榄枝”。一方面,在以意识形态对抗为目的、军备竞赛为基本手段的冷战背景下,主动选择“无伤大雅”的体育和平竞争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友善的外交信号;另一方面,体育竞争与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有着本质区别,是一种基于双方遵守共同规则、共同办赛的合作式竞争。正如70年代美国政府立即正确识别出乒乓球队访华邀请中的友善信号,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策略性改变,是一种“微笑外交(smiles diplomacy)”<sup>[27]</sup>。综上所述,体育行为意涵的共享性和明确性,赋予了体育以外交信号形态存在时对于信息意义共有的独特编码价值,这不仅是外交信号有效传递的前提,更是国家间信任困境破除的关键。

### 2)构建安全可靠的外交信号交换空间。

国际关系复杂性的重要来源是其糅合了政治战略、历史文化、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蝴蝶效应”是敏感的国际政治的常见现象。在外交信息得到有效编码之后,如何安全、可靠地向对方递送是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体育可以为交往双方构建安全可靠的外交信号交换空间。在美苏田径对抗赛案例中,冷战背景下美苏“思想战”的政治话语很难透过“铁幕”,同时期两国的广播台、出版物等往往要通过“偷渡”方式才能散布<sup>[28]</sup>。但两国的体育外交信号却得以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对方。体育构建良好外交信号交换空间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体育外交的非政治性带来的安全感,附着其上的国际政治信号能够顺利通过“安检”而得到信任。从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双重角度看,其对体育外交信号的处理同样能够有选择地进行范围限定,既可理解为政治相交,亦可视为纯粹体育往来,从而保障双方的政治安全;二是,体育外交的可接触性带来的真实感,体育外交信号可以是一种“身体的表达”,进而实现外交信号无损式的直接交换。综上所述,体育能够在明确外交信号意涵的基础上,通过体育与政治的区隔对体育外交信号的呈现方式、作用范围等形成限定,确保信号的有效传递,这种限定使得体育外交信号的交换是安全可靠的过程。

### 3)赋予生动有效的外交信号转换能力。

根据认知主义信号理论,信息的生动性影响对其可信度的判断<sup>[29]</sup>。在缺乏第一手信息或个人互动经验

时,领导人更倾向于关注生动的事例与信息,而勉强依赖那些枯燥、抽象与客观的报告,即便后者是极为真实的也不一定会得到高度重视。就体育而言,场内的体育具有竞赛美学价值,在场外则具有政治宣示价值。无论是领导人亲切接见代表团,还是共同出席观赛等,体育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关系转换作用。外交信息通过体育的编码和解码,能够体现出足够的生动性,更易受到国家领导人与民众的接受。在美苏田径对抗赛的案例中,赫鲁晓夫并不选择正式但生硬的邀请语,而是选择更加平易近人的“假如你们赢了,我们会为你们欢呼”,朋友式问候增大了体育外交信号的有效性。实际上,体育外交信号的生动转换能力植根于编码过程中对共有规则的遵守,进而在信号准确传递后得到有效呈现,暴露在公共视野下的体育外交在事实上发挥了政治关系“显示器”作用。综上所述,体育外交信号在编码和传递之后,借助体育的身体性、实践性和公众性,能够推动内含信息的生动转换和有效解构,从而帮助双方完成外交沟通的信息闭环。

通过国际政治信号理论解构美苏田径对抗赛形成过程中的外交互动,两国进行了多轮次体育外交信号的编码、传递、解码与反馈,推动《麦卡伦-沃尔特法案》的废除与首份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的出台,历史性地实现了美苏在“铁幕”下最初交往与合作。体育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传递外交信息、表达战略诚意和化解安全困境的独特作用,这些价值的实现得益于体育在外交信号编码方式、交换空间和转换能力上的优势,从而消除国家间的主体间性。只有不断超越旧有研究范式,从原理层面展开探索,才能真正实现体育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进而推动实践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曹德军. 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2.
- [2] KYDD A.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J]. Security Studies, 1997, 7(1): 114-155.
- [3] JERVIS R L.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
- [4] 罗伯特·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秦亚青,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353-447.
- [5] PETERS K. Track and field's greatest dual meet is turning 50[N]. Peninsula Times Tribune, 2012-07-19(01).
- [6] Turrini J M. "It was communism versus the free world": The USA-USSR dual track meet series and the

- development of track and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85[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2001, 28(3): 427-471.
- [7] 赵玉明. 文化冷战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以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点[J]. *俄罗斯研究*, 2013(1): 88-106.
- [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I: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8: 657.
- [9] SUNY R 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The twentieth centu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49.
- [10] KENNAN G F. *The Charg é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ume VI: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8: 2138.
- [11] RICHMOND Y.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M].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
- [12] МОРОЗОВ В П. Пятнадцатые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Закончились[N]. *Правда*, 1952-08-04(04).
- [13] CULL N J.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1945—1989)*[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3.
- [14] КЛОЧКОВА М. Легкоатлетические Матчи СССР-США[N]. *Беговой клуб*, 2016-05-14(01).
- [15] POSNIKOV D. Visits of U. S. athletes sought under new policy of Soviet Union[N]. *New York Times*, 1954-02-10(39).
- [16]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uropean Affairs.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uropean Affairs to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ume VIII: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8: 3238.
- [17] 刘桂海. 体育政治化: 一个“场域”的理解[J]. *体育学刊*, 2015, 22(6): 8-13.
- [18] The State Department. Soviet request weighed: State department considers bid for track visit[N]. *New York Times*, 1954-02-12(30).
- [19] WEINER T. Russians' tour barred: Ferris turns down proposal for basketball trip here[N]. *New York Times*, 1955-10-22(17).
- [20] MIDDLETON D. Russians invite U.S. track squad[N]. *New York Times*, 1956-08-14(29).
- [21] LYALL S. Moscow track bid accepted by U.S.[N]. *New York Times*, 1956-11-17(01).
- [22] MEYERS W H. Khrushchev backs track bid[N]. *New York Times*, 1957-04-30(02).
- [23] ПОПОВ А. СССР-США: Спортивные войны XX века[N]. *Советский Спорт*, 2004-03-27(01).
- [24] MURRAY S. *Sports diplomacy: Origins,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203.
- [25] KISSINGER H A. *White House year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923.
- [26] 周立华. 体育搭建跨文化交际的平台[J]. *体育学刊*, 2005, 12(5): 23-25.
- [27]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 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8: 914.
- [28] 赵继珂. 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行为研究(1953—1961)[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72.
- [29] VERTZBERGER Y Y I.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